

夜光杯

醉里谈诗(六)

陈鹏举

诗是梦境。诗人是活在梦境里的人。这一点应该可以肯定。原先总说诗和酒有关,所谓“李白斗酒诗百篇”,其实是一种误会。古时候的酒,酒精度不高,喝醉的可能性不是很大。也就是喝多了,有些迷糊的感觉,有助于入梦而已。酒一定不是诗人写诗的密钥。主要成就诗和诗人的,只能是梦境。

王维的“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”、“万壑树参天,千山响杜鹃”,杜牧的“折戟沉沙铁未销,自将磨洗认前朝”、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”,李商隐的“瑶池阿母绮窗开,黄竹歌声动地哀”,王昌龄的“秦时明月汉时关,万里长征人未还”,哪一句写的不是梦境,或者说哪一句不似梦中所得?

李白写庐山瀑布,说是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”。大家去看了,都认为不是这回事。瀑布很小,是否李白那时候大呢?即使大,也不至于银河的模样吧?说是李白用了夸张手法,这说法哪像是在说诗?诗人写诗会想到手法吗?从来不会。

诗人写诗,是在人生和万象之间寻找一种美的关联。这种关联只有在梦境里,才可能完美。李白在庐山看到瀑布,他突然就入梦了。他在他的梦境里,看见好大好大的瀑布,感觉就像银河落了下来。李白是天人,他感觉瀑布一定和银河有关,就像他写黄河,就会写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一样。到过壶口的人,同样知道黄河不如诗来得壮观。但几乎没人质疑李白的这句诗。因为黄河是母亲河,人人都愿意相信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。

有所思,有所梦。梦境的美在于,它来自经验里的人事、情景,又把这些人、情景重组了,一切美不胜收。李白没去过蜀道,而就是他写了《蜀道难》,而就是这篇《蜀道难》,让他一时间名满长安。那时候是诗的年代,长安的诗人好多,长安就在梦境里。

杜甫是伟大的诗人,他一生生活在自己的梦境里。他的《绝句》:“两个黄鹂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。窗含西岭千秋雪,门泊东吴万里船。”每一句都是经验里有的,只是在梦境才可能一字不差地出现。他的《登高》:“风急天高猿啸哀,渚清沙白鸟飞回。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。万里悲秋常作客,百年多病独登台。艰难苦恨繁霜鬓,潦倒新停浊酒杯。”是唐人写得最好的一首七律。他登上了白帝城外的高台,他笔下所写的,是一个老病潦倒的诗人,梦想中依然不朽的山河。杜甫最伟大的诗篇是他的《秋兴八首》。《秋兴八首》,是诗人和诗留给了后世的伟大梦境。家国人天,顺遂艰苦,在杜甫的梦境里,深情著白,气象万千。杜甫之后,这种梦想的力量,诗的力量,几乎不再见到了。

说到诗是梦境,还要提一下李贺。他一直活在梦里,活了二十七年。他的诗,几乎全是梦话。“茂陵刘郎秋客,夜闻马嘶晓无迹。画栏桂树悬秋香,三十六宫土花碧。”随手录上几句,就跌入他的美梦了。

巴黎的马尔克斯

邵毅平

我年轻时就读过马尔克斯——当年又有谁没读过他呢?一头母牛出现在族长家的阳台上,嚼着天鹅绒窗帘,欣赏着落日;已有几个世纪了,人们搞不清楚族长是否还活着……可我没想到的,过了那么多年,我竟然还在读他,一直读到几年前的一天,我在巴黎触摸到了他。

1955年,作为一家报社的记者,马尔克斯被派往欧洲。翌年,因报社遭到查封,他失去了生活来源。于是他就像当年的海明威,年轻而贫穷,在巴黎漫无目的地飘荡着。我寻寻觅觅住过的克吕尼旅馆时,曾路过其隔壁的三学院旅馆,旅馆门口的墙上挂着一块牌子,写着马尔克斯1957年在那儿住过。那家旅馆位于居雅街靠近索邦那头,离圣米歇尔大街及卢森堡花园不远。马尔克斯大概经常出没于那一带,就像三十多年前“巴漂”的海明威,而后者正是他当时的偶像之一。直到有一天——

“我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,那是1957年巴黎一个春雨的日子,他和妻子玛丽·韦尔什经过圣米歇尔大街。他在街对面往卢森堡花园的方向走,穿着破旧的牛仔褲、格子衬衫,戴一顶棒球帽……他已经59岁了,体格壮硕,想不看见都不行……在旧书摊和索邦大学出来的大批学子当中,他显得生气蓬勃,想不到四年后他就去世了。”

马尔克斯用双手围成喇叭,向街对面的人行道大喊:“大师!”海明威明白在人群中不会有第二个大师,就转过头来,挥了挥手,也用卡斯蒂利亚语对他大叫:“再见,朋友!”立刻又消失在人群中。

我也无数次走过圣米歇尔大街,大街相当宽阔,尤其是接近卢森堡花园的那段。我不禁好奇,他俩得使多大劲,才能让彼此听见?

马尔克斯以后再也没有见过海明威。这次邂逅给了他一种感觉,曾经有什么出现在了他的生命里,从此就没有消失过。后来



对许多人来说,一座城市,一个地方,只有与他喜欢的人事有关的,才可能具有意义,其余的都不存在。就像捷克的赫拉巴尔来到伦敦,只在乎与艾略特有关的景点,每到一处便整段诵读《荒原》。马尔克斯所述的这些场景,源自海明威的《流动的盛宴》,其中充满了迷人的个人色彩,让巴黎盖上了海明威的印记。马尔克斯一定熟读了它,然后揣着它重返巴黎,无论在现实还是在想象里。马尔克斯说过,长年阅读一位作家的作品,对他又如此热爱,会让人分不清小说和现实。

另一方面,《流动的盛宴》始撰于1957年的秋天,就在巴黎大街上那次邂逅后不久。那个年轻的用西班牙语喊他“大师”的崇拜者,是否让海明威闪回到了自己的青春时代,触动并打开了他回忆“巴漂”往事的闸门?然而马尔克斯不知道的是,那个曾经属于海明威的巴黎,因为他的生动描述,现在又重叠上了他的身影,让后来者既看到了海明威,又看到了他。这就像中国诗人说的:

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,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”对马尔克斯来说,那个早晨昙花一现而又永恒不灭,在那个春雨潇潇的5月天,海明威隔着大街对他喊:“再见,朋友!”而对所有的文学爱好者来说,那样的场景也已经成为经典,就像在5月巴黎中午的阳光下,斯万夫人站立在宛如紫藤绿廊的阳台上,在斑驳的光影中与小赛尔谈话一样。在暗香浮动的5月的巴黎,我多么希望自己也有这样的幸运,在大街上邂逅一次那样的风景,尽管我已不再年轻也说不上贫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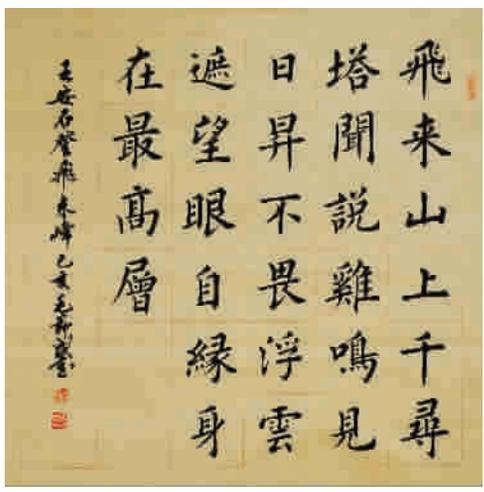
二十多年前在甘南玛曲见到黄河,这里是她于沱沱河源起玛曲草原的第一弯。从县城到黄河边大约需要45分钟,草原上没车,去那里全凭两只脚。途中还遇到藏獒追赶我们,好在我用了声东击西之计,总算脱了险。当气喘吁吁赶到黄河边,看到那条悠悠地从远处拐过来的接近土色的河流时,忽然被那种平静、毫无张扬、不紧不慢的淡定怔住。太朴素、太平常了!难道这就是我心中伟大的黄河?难道这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?我坐在黄河边思考着。黄河在这段水域很宽阔,静静地朝东流淌,不时闪出一个个小浪花,让你感到一种实实在在的平常心。仔细想想,黄河具有敬畏山川的谦逊;黄河为我们灌溉良田,孕育生命。那是一种默默的奉献,是一种平凡的伟大。

黄河在这里拐了个弯

黄阿忠

活动,西夏王国也一定和这里有关系。不然,两岸蜿蜒的山岩怎会读出那些沧桑,又怎能感悟到历史留下的印痕?默默流淌的黄河在山体、平原中穿行,见证了历史的变迁;黄河没有寂寞,群山为她行注目礼,哗哗的水流声向她问候,弯道是不会错过风景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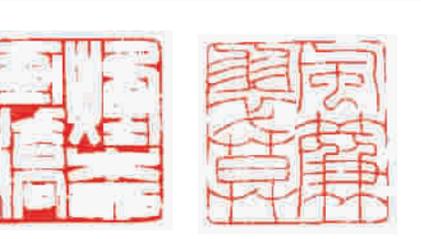
我想,黄河在中卫的拐弯或许是为了积蓄,让河流缓缓地等待后来的水流,积蓄更多的水量,再冲向下一个弯道。在黄河上有许多水电站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弯道蓄水这个原因。当黄河流到陕西、山西的壶口时,由于地势



毛节民 书法

的落差而形成瀑布,因为蓄水产生的力量,使黄河沸腾;由于积累的碰撞,使黄河激昂。我们常常把黄河比喻中华民族,或许就是力量、沸腾、激情的民族精神,中原文化源远流长,黄河象征中华文化源远流长,博大精深。我想,拐弯、停顿并不是什么倒退,而是积蓄力量,为下一次有更大的崛起。

黄河边常常能见水车,中卫沙坡头可能更多,那是黄河边的一道富有生趣的风景。水车或许是根据水量的多少而安置的。我想水车一定有两三千年历史吧,不然的话,万顷良田的灌溉怎么能实现?水车是利用转动将水传送灌溉,而制作水车,又体现了古代的工匠精神。水车的轴距、轴系的运转,带着挡水板,其制作需要精湛的工艺。或许,这个水车是被我们称为工匠祖师爷的墨子发明的。三国时代诸葛亮设计制作制作的“木马”,那是用在战争上的,这里不说功能,单说制作工艺,可谓和用在农业灌溉上的水车同工异曲。或许水车还在使用,我在河滩下滩村那轮大水车看到了引水的闸门,输水的木渠,至于引到哪里去灌溉我不知道;水车或许已经成为一个装置,远看取形状,圆和长、方的组合,近观有构成,轴承穿插、支架独特。其结构精巧、造型独特、轴承穿插,疏密搭配得当,很有审美意义。



烟柳画桥 风帘翠幕 杨扬作

古代的工艺,是不是还得保留一下,让我们的后代也看一看这个发展的流程。

黄河边的桃花开了,柳树也绽出了嫩芽,虽然只是零星的几棵,然在灰褐色山体的映衬下,忽然有了亮丽,使你看到了春天的生机。和这灰灰地地最协调的是梨花,北长滩一带有许多三百多年的老梨树。一到春天,白色的花布满黄河畔,直引得人们拖家带小,偕友前来观赏,此情此景,虽不及日本东京上野公园樱花,武汉大学樱花的观赏阵势,但也有几分热闹可观。

那天风沙扬起,吹来一阵小雨,春来带雨梨花开。细雨不大,却也润湿了土,剔透了晶莹的白花,小雨挂透了花瓣的尖尖上,还真有诗意。想起当年诗人岑参将塞外的雪喻为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,想来那时观赏梨花已经很盛行了。白色的梨花在灰色的山和土色的民居中显得十分动人,那是因为白色在一片灰色中凸显了亮点。

我想起了白色的樱花,盛开时清冷、纯洁,那种白色让人心醉,而风吹花落,地上铺满花瓣,则是一种凄美;同样是白色的梨花,开在春风中显得朴拙、厚实,就像从泥坯房中走出的一个清纯美丽的姑娘,若是花瓣吹下,则飘入黄河,跟着拐了个弯,向东流去。



伴随着上海解放的隆隆枪炮声,钱庄业何去何从?身份殊异的钱庄发挥着拾遗补缺的金融职能,迎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洗礼。

进城的解放军在南京路上席地而睡的场景,让亲眼目睹这一幕的“上海滩钱业巨子”秦润卿百感交集。秦润卿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,就以福源钱庄经理的身份出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,在顺流、逆流中引领钱庄业砥砺前行。从钱庄学徒、跑街干起,秦润卿在福源钱庄摸爬滚打,一干就是32年,直至晋升为经理。

与钱庄一道跨进新时代的秦润卿,从私营钱业的联营、联管到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,都表示出对新政策积极拥护的态度,被人民政府评价为“上海钱业界的元老,极有威望”。1950年初,为解决新中国的

财政困难,国家推出“人民胜利折实公债”。发行伊始,“共和国掌舵”陈云预判到重重障碍:“目前工商业尚未正常生产和经营,公债派下去可能会‘叫’的。”然而,秦润卿非但没“叫”,自家的福源钱庄率先认购了15000份,价值旧币2.5亿元,还动员沪上金融同业“运用集体的力量,量力分担,聚沙成塔”,超额完成206万份的认购任务,令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赞不绝口,称其为“金融模范”。

无独有偶,朝鲜战争爆发后,福源钱庄经理又自掏腰包,共同捐献1000万元,鼎力支持抗美援朝运动。

众人同心,其利断金。上海解放初期,私营棉纺织业遇到资金困难“嗷嗷待哺”,而钱业好似“夜行迷路”贷款缺

挥别最后的钱庄

黄沂海

失方向,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牵头搭桥之下,开展了两次以私营钱庄为“主力阵容”的联合放款业务,引导减少支援生产建设之急需,减少私营金融机构投资的盲目性:一次加盟的钱庄最多,共有存德、顺康、元盛、聚康兴、惠昌源等钱庄64名职员全部入会。事实上,秦润卿一贯作风务实低调,为人谦和亲民,与职员们“朝夕相处,感情深密”,他表示“希望每日晚上谈话,不分阶级,不拘礼教,坦白地交换意见”。工会的成立逐步取代了原先的董事会,钱庄职员先进了本来只有董事、经理才能入席的会场,提高了职工在钱庄中的地位,当涉及公私关系的纠纷时,由劳资协商会议用“公私协商”的办法解决。钱庄每年还按职工工资比例提取文教经费,用于工会开设银行会计、合作经济、速记、俄文等课程的文化培训。

秦润卿依然蛰居在闸北海宁路浙江路口一个叫“咸宁里”的旧式石库门弄堂里。即

便年事已高,德隆望尊,他仍每天坚持步行到钱庄视事。有人劝秦润卿在家里多多休息,有事可以上门请教,他说:“人民政府对我这么关怀照顾,我怎能无功受禄?”

早于整个工商业的公私合营,1952年,私营银钱业最先实现全行业改造,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破土而出,秦润卿被推选为副董事长,那一年他已经76岁了。同年7月1日,他把钱庄厚厚的账册移交给了黄浦区政府财贸办公室,还将自家的藏书楼“扶云楼”房产以及4万余册家藏图书捐赠国家。

从此,上海的钱庄作为一个历史名词,被收进了金融词典。

上海刚解放,出世半载的第一版人民币就将在这里流通使用。

十日谈

上海的早晨 责编:龚建星